

商务印书馆海外汉学书系

中国善会 善堂史研究

〔日〕夫马进 著



商务印书馆

汉学

海外

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

〔日〕 夫马进 著

伍跃 杨文信 张学锋 译

商务印书馆

200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日]夫马进著;伍跃、杨文信、张学锋译,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商务印书馆海外汉学书系)
ISBN 7-100-03995-9

I. 中… II. ①夫…②伍…③杨…④张…III. 社会救济—社会团体—历史—研究—中国—明清时代—民国 IV. D693.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 第 10638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ZHŌNG GUÓ SHÀN HUÌ SHÀN TÁNG SHĪ YÁN JIŪ

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

[日] 夫马进 著

伍跃 杨文信 张学锋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3995-9/K·794

2005年6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5%

定价: 40.00 元

中文版序言

在本书的日文版出版之后不久，曾经有过数次欲将本书译成中文出版的计划，其间还有过不少与翻译出版有关的传闻。其中，最让我感兴趣的“传闻”是，中国国务院下属民政部（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有关负责人曾经推荐将本书译成中文出版。当然，我个人无法判断这一“传闻”是否属实。不过在当代中国，对于社会福利问题的关心前所未有地高涨，所以我觉得上述“传闻”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可信的。但是，本书是区别于论述当代中国的一般读物，属于历史研究的专门性著作。例如，在对本书内容的理解方面，仅仅依靠通晓日语是远不够的，还需要具有关于中国历史的基础知识。而且，本书在日本出版发行的中国历史研究的专著中属于分量最大者之一，仅以页数而论已经超过一般专著的一倍以上。内容较为专门，除了一般叙述之外，更多的是关于具体历史事实的描述。坦白地说，我曾经很担心能否有人胜任如此困难重重的专著翻译工作。

由于南京大学范金民教授的提议，本书中文版的翻译出版被正式提上日程。中文翻译分别由伍跃教授（大阪经济法科大学）、杨文信博士（香港大学）、张学锋教授（南京大学）三人担任。这三位译者不仅具有很好的研究和日语能力，而且他们在京都大学学习期间都曾经听过我讲授的“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在他们之

外很难再找到如此合适的翻译者。因此,我立即同意了范金民教授的建议,翻译工作随之全面展开。

如同本书“后记”中所说,我本人开始这项研究是在1979年或1980年初,首次发表有关论文则是在1982年。那时,无论在哪里都根本无人提到“善会、善堂”。这种情况激发了我研究这一问题的兴趣,而且我当时预计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恐怕最快还要等上10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地球实在是太狭小了。直到1988年,我才知道美国的韩德琳(Joanna Handlin Smith)博士于1987年发表了关于明末同善会的研究论文,而台湾的梁其姿教授则早在1984年就发表论文,讨论江南地区育婴堂在清代初年诞生的问题。梁其姿教授原是在香港和法国专攻历史学并从事研究活动的,在这个意义上,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上述三人都是可以称为在“中国”(中国大陆)以外研究这一问题的研究者。据我所知,“中国”(中国大陆)学者正式开始考察善会、善堂问题的当属陈宝良教授(1996年)。此外,在日本广岛大学留学的王卫平教授(苏州大学)提交了包括有善会善堂研究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是在1997年。在今天的日本,比我年轻的小浜正子教授(鸣门教育大学)和吉泽诚一郎教授(东京大学)等新一代的研究者们将善堂问题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问题之一进行着深入的研究。现今的研究状况与根本听不到“善会、善堂”的1980年前后相比,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本书的“序论”中,我曾经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美国的中国史学会将善会、善堂问题作为与哈贝马斯(J. Habermas)所提出的“市民的公共性”,即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等问题相关的重要问题,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在本书的“后记”中,我也

提到过这一研究的动机,其一是对中国前近代地方自治萌芽问题的关心,另一个则是对中国早期社会福利史问题的关心。但是,我最初阅读哈贝马斯所著《公共性的构造转换》(细谷贞雄译,东京,未来社,1973年)的时候,恰恰是我刚刚开始本研究的前后。我之所以能记住这一时间是由于以下原因。因为告诉我这本书的是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野村雅一教授,他于1979年4月至1982年3月在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主持了共同研究班,而我本人正好参加了这一研究班。在当时只有中国史研究者们聚集的研究会上,根本不会提到哈贝马斯的名字。我被该书中所论述的“市民的公共性”所吸引,立即感到可以将这一理论和我当时刚刚开始着手的善会、善堂史研究结合在一起。不过,我在研究中没有将哈贝马斯的观点置于主要的地位。其原因之一是我对哈贝马斯的观点尚不能全部理解,而另一个原因则是“公共领域”和“市民的公共性”这一模式原产于欧洲,在这一点上与“近代资本主义”的模式是完全一样的。我觉得,如果采用在中国前近代中寻找“公共领域”和“市民的公共性”模式的研究方法的话,最终无疑会与寻找“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方法一样,走入死胡同。

1989年至1990年,我作为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获得了赴美研究的机会。当时,我了解到美国的中国史学界正在进行着可以称为“寻找公共领域”的研究。本书中介绍的玛丽·兰钦(Mary B. Rankin)教授、罗威廉(William T. Rowe)教授的著作也正是我在赴美期间阅读的。至今我还记得,1990年4月,在芝加哥召开的美国亚洲学会(AAS)的年会上,首次见到来自霍普金斯大学的罗威廉教授,并在一起讨论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理论的情景。那时,罗威廉教授亲手给我即将在《近代中国》(Modern China)第

16 卷第 3 期(1990 年)上发表的新作——《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The Public Sphere in Modern China)。而且,我当时还了解到 1962 年用德文首次出版的哈贝马斯的著作直到 1989 年才有英译本问世,罗威廉教授就是在该书英译本出版的刺激之下发表上述论文的。相比之下,哈贝马斯该书日文译本的出版远早于英译本问世的 1973 年,这一点反映了日本社会学界的特异性。罗威廉教授的上述论文不仅给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者们以很大的刺激,也大大地影响到中国的学者们。1992 年 5 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唐振常教授将他于 1991 年 12 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所召开的学术会议上发表的《市民意识与上海社会》一文亲手给我,该文就是以罗威廉教授的上述论文为前提论述近代上海的。根据我的印象,在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中开始讨论“公共领域”问题,还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

从本书的日文版问世至今已经过去 5 年多了。在这 5 年多的时间里,虽然出现了很多与本书有关的研究专著和论文,但是我想尚无必要对本书的基本观点进行修订,除了表达上的个别问题之外,中文版中做了较大修改的只有第八章的注释⑤(本书页 437)。其原因请参见该条注释及其所引抽稿。此外,中文版还新增了征引书目。

以下两点是在日文版执笔时如果知道的话必定会写入的内容。

其一是关于蔡元培所著《清节堂记》。曾经声援过“五四”运动的思想家蔡元培和他所撰写的《清节堂记》,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曾感到这两者之间并不吻合。我甚至怀疑过该文是否果真是蔡元培所撰,并曾经设想该文写于清末,而且是胸襟恢宏的蔡元培

受故乡绍兴府的熟人所托、不情愿地为嵊县清节堂撰写的。在本书出版之后,我读到了蔡建国教授所著《蔡元培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得知蔡元培撰写《清节堂记》至少是因为存在着他无法回绝的因素。这不仅是因为他在11岁丧父之后,是慈母历尽千辛万苦将他抚育成人,而且还因为他受到了慈母的深刻影响。我在阅读蔡建国教授的著作时,脑海中几乎完好无缺地重叠着蔡元培和他母亲以及在上百年前构想了贞苦堂(清节堂)的考据学者汪中和他母亲的身影。倘若我在执笔以前稍微留意一下幼年时期的蔡元培,肯定会在叙述汪中的贞苦堂构想时提到蔡元培。重刊,日,月,年,2008

其二是关于史料的问题。本书第一章第二节曾经提到,根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内阁题本户科赈济类的史料,与养济院有关的记载始见于雍正十三年(1735)。这一点基本上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当时我没有考虑到康熙年间及其前后的有关史料在编纂《乾隆大清会典》之前可能已经散佚。顾及这一点是因为两年后,我在阅读中朝关系史史料时得知,负责清朝对外事务的官僚们常常引以为据的档案在乾隆年间已经散失。如果确实存在着养济院档案散失的可能性的话,那么就会在第一章第二节叙述这一情况,而且倘若今后发现了有关的档案史料的话,就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增订。

现在,在中国清代史和民国史的研究中,档案史料的发掘与利用都在积极地展开。今后,在善会、善堂史的研究上将会更多地利用档案史料。本书在善会、善堂史研究方面,仅仅是根据各种《征信录》、《申报》和文集随笔等史料描述了善会和善堂的轮廓。随着新的档案史料的发掘和利用,本书在将来也许有必要做大幅度的

修订。但是,对于著者来说还有比这更值得高兴的吗?《书》(1)在本书的执笔以及资料收集过程中,得到了许多海外学者的帮助。除了上述从事与善会善堂有关的研究的各位先生之外,特向丁义忠先生、居蜜先生、任道斌先生、王鹤鸣先生、朱金甫先生表示深深的谢意,并谨向提议将本书译成中文的范金民先生以及从事了这一困难的翻译工作的伍跃先生、杨文信先生和张学锋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

2002年4月7日,时逢54岁生日

夫马进

目次

序论——研究史与课题的设定	1
---------------	---

第一部

第一章 善会、善堂出现以前——以明代的养济院为中心	30
---------------------------	----

序言	30
----	----

第一节 鳏寡孤独政策的理念	30
---------------	----

第二节 到宋元时代为止的鳏寡孤独政策	33
--------------------	----

第三节 明代的养济院	44
------------	----

一 养济院的初始和原籍地收养主义	44
------------------	----

二 各州县设置主义与实际运营	51
----------------	----

第四节 吕坤的养济院政策	57
--------------	----

小结	66
----	----

第二章 同善会的诞生	78
------------	----

序言	78
----	----

第一节 明末的同善会运动	79
--------------	----

一 吕坤的同善仓和杨东明的同善会	79
------------------	----

二 武进县、无锡县、昆山县的同善会	82
-------------------	----

三 嘉善县的同善会	85
-----------	----

四 太仓州的同善会	88
-----------	----

2 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

第二节 清代的同善会	89
第三节 同善会的组织和管理	93
第四节 同善会运动的思想	106
小结	114
第三章 善会、善堂的开端	126
序言	126
第一节 放生会(放生社)	127
第二节 掩骼会、一命浮图会、救生船、恤嫠会和普济堂	138
第三节 育婴堂	143
第四节 善会兴起的时代	151
小结	160
第 二 部	
第四章 清代前期的育婴事业	178
序言	178
第一节 明末的育婴事业	180
第二节 育婴堂的创设及其经营方式	186
第三节 苏州育婴堂的实际状况与留婴制	199
小结	210
第五章 清代松江育婴堂的经营实况与地方社会	229
序言	229
第一节 育婴堂的组织形态	231
第二节 资金的收支与育婴的实际成绩	239

第三节 接婴事业与城镇关系	250
小结	261
第六章 清末的保婴会	270
序言	270
第一节 育婴堂保育的几个问题	271
第二节 保婴会的出现	278
第三节 保婴会的实际成果	283
一 上海县	283
二 浙江南浔镇、桐乡县	292
第四节 保婴会保育的问题	303
小结	310
第七章 清代的恤嫠会与清节堂	319
序言	319
第一节 恤嫠会和清节堂的创始	320
第二节 恤嫠会的经营状况	332
一 杭州恤嫠集	332
二 成都恤嫠会	341
第三节 清节堂的经营状况	349
一 安徽清节堂	349
二 上海清节堂	359
三 丹徒完节堂	376
四 杭州清节堂	382
第四节 清节堂的几个问题	389
小结	403

第三部

第八章 善堂的官营化与善举的徭役化——由普济堂的

经营看“国家”与“社会”	418
序言	418
第一节 雍正帝的福利行政观	421
第二节 河东总督王士俊推行的普济堂“官设”	424
第三节 清代的养济院与普济堂的养济院化	430
第四节 由苏州普济堂看“国家”与“社会”	437
小结	445

第九章 杭州善举联合体与都市行政、行会及国家

序言	463
第一节 杭州善举联合体与都市行政	466
一 组织形态与事业的内容	466
二 被称为善举总董的人们	476
第二节 杭州善举联合体与同业行会	482
一 盐业行会	485
二 米业行会	489
三 箔业行会、锡业行会和木业行会	496
第三节 杭州善举联合体与国家	501
一 与国家的关系及其会计报告	501
二 经费不足与善举总董的徭役性	507
小结	516

第十章 上海善堂与近代地方自治	533
序言	533
第一节 太平天国以前的诸善堂	536
一 同仁堂、辅元堂	537
二 育婴堂	547
第二节 太平天国以后的上海善堂	556
一 同仁辅元堂的成立及其开展的各项事业	556
二 果育堂、沪北仁济堂、普育堂以及其他善堂	572
第三节 与行会的关系及资金问题	583
第四节 从同仁辅元堂向总工程师局的过渡	592
小结	600
第十一章 上海的都市近代化与义冢问题	617
序言	617
第一节 义冢问题的发生及其激化	620
第二节 义冢问题的终结	629
小结	636
后论	643
附篇一 清代沿海六省的善堂普及情况	655
附篇二 关于“征信录”	706
后记	726
征引文献	735

索引	766
解说(范金民)	797
830	堂善新前以国天平大 第一章
837	堂元解,堂二同 一
843	堂要育 二
850	堂善新上以国天平大 第二章
855	业事原看由照其以立如的堂元解二同 一
873	堂善新其以堂育管,堂二北,堂育果 三
883	同金为又承关内金计色 第三章
892	英世由原壁工总向堂元解二同从 第四章
900	总小
910	同家义已北升近市福临善上 章一十第
917	言中
920	外篇其及主发由同家义, 章一第
929	论论由同家义 章二第
930	总小
943	总司
950	品前及善堂善的官六善出升第 一章第
956	"系前正"关于 二章第
957	总司
985	施文民总

序 论

——研究史与课题的设定

一

关于本研究的目的在于说明曾经广泛地存在于中国的善会与善堂 [3] 的历史。如果要给善会善堂下定义的话,那么可以指出的是:善会是个人自愿参加的、以实行善举为目的的自由结社,而善会办事机构的所在以及具体实施善举的设施则是善堂。在清代,以善会、善堂为核心的慈善事业一般被称为“善举”,从事这一事业的人们一般被称为“善人”或“善士”。 [4] 善会和善堂在清代中国的各地曾经普遍存在,特别是在善会善堂非常集中的江南地区的地方志中,在“善堂”等项目下保存有大量的史料。

但是,直到近年为止,即使在历史研究者中间对善会善堂的关心也显得微不足道。几乎没有什么著作可以称之为真正的学术研究。以1962年全部出齐至今仍然作为最详尽的中国历史事典在我国被广泛使用的《亚洲历史事典》(东京、平凡社)为例,该书 [5] 中“善书”一条由酒井忠夫执笔,但是书中没有“善会”、“善堂”的条目。在条目之外,根据该书的索引,这部多卷本的事典没有一处提到“善会”与“善堂”这两个名词。 [6] 这充分代表了1960年前后的研

究状况。这种状况直到1980年前后几乎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方面的情况也相差无几。在1992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卷》(上、下)中,也没有关于善会善堂的说明。在中国,无论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还是之后,由于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有关,行会和会馆常常被作为研究的课题,有时甚至成为争论的热点。但是,善会和善堂始终没有成为讨论的对象。因此,善会和善堂直到近年为止已经被遗忘,而且关于它的历史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关注。

实际上,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人关注过善会和善堂问题,但是对它的研究却非常少。中国人自身在历史上对善会善堂倾注的关心是本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一,而且正是他们的记录构成了研究这一问题主要资料。这些在本书中将会做详细介绍。我想在此提出如下一个问题,作为旁观者的外国人,即欧美人和日本人到目前为止是从什么角度来观察善会善堂问题的。在概述外国人的观察的同时,我想对下述问题进行整理,即同样作为观察者、但却远离“善举”时代的我们,应该研究善会善堂的哪些问题。与此相关,我还要综述近年来与善会善堂问题有关的研究状况,以此作为本研究的序论。

- [5] 首先对善会善堂表示了极大关心的外国人恐怕是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在矢沢利彦注入了很大心血的译作《耶稣会传教士中国书简集》中,收录许多记录了中国人杀害婴儿以及为了拯救这些婴儿而设立的机构——育婴堂的书信^①。其中,传教士殷弘绪